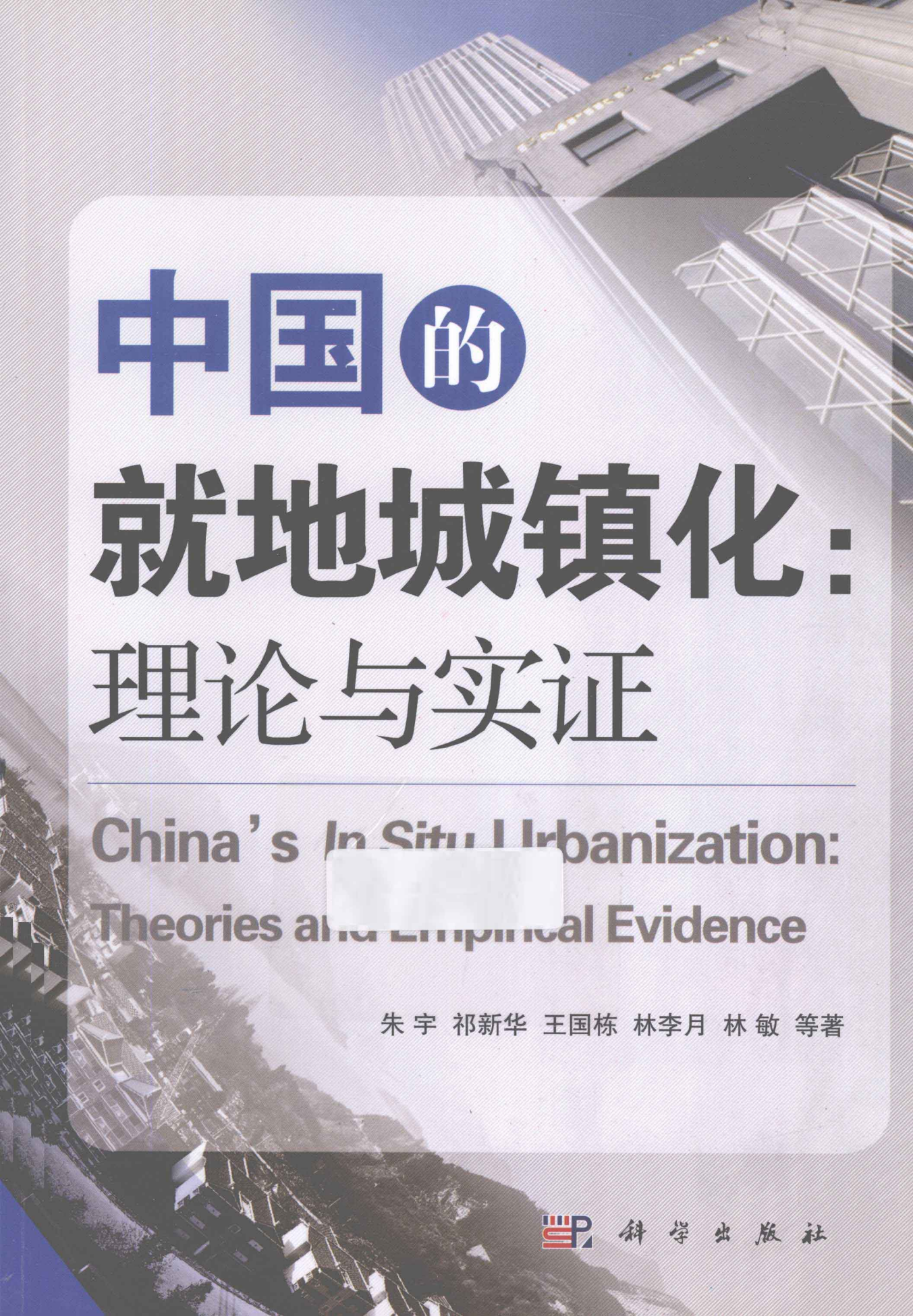




中国的 就地城镇化： 理论与实证

China's In Situ Urbanization:
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朱宇 祁新华 王国栋 林李月 林敏 等著



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中国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演变与对策研究”(07BRK007)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项目(J0830521)

福建师范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基金(fjsdj k2012071)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

China's *In Situ* Urbanization: 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朱 宇 祁新华 王国栋 林李月 林 敏 等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首部对就地城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专著,是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就地城镇化是在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近期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被著名学者约翰·弗里德曼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本书突破城乡二元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发生发展的宏观和微观机制、演变趋势和发展前景、理论意义和规划调控方向,并在构建和发展能够反映就地城镇化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城镇化理论上做了积极的探索。

本书适合从事人口学、人口地理学、城市与区域研究、城乡规划等领域的专业人士、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朱宇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03-035747-2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F299.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573 号

责任编辑:许 健 / 责任校对:刘珊珊

责任印制:刘 学 / 封面设计:殷 靓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上海欧阳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1/4

字数:285 000

定价:65.00 元

Preface

前言

乡村地区的聚落和人口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和重组而实现向城镇或准城镇类型转化是在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近期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被笔者称为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近年来这一现象已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曾被国际著名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笔者自 1995 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长期研究,在国际、国内相关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2007 年笔者又有幸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进行“中国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演变与对策”项目的研究,使这一始于国外、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得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书既是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汇集了笔者及其团队多年来在就地城镇化问题上的思考。全书基于大量实证研究和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现象进行了正面、直接和完整的检视,揭示了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发生发展的宏观和微观机制、演变趋势和发展前景、理论意义和规划调控方向,希望借此突破迄今在城乡二元的分析框架内研究就地城镇化的局限,以对这一在人类聚落近期演变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获得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能够反映就地城镇化实际的城镇化理论,并使其走向世界。

全书共分九章,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指出就地城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界限的淡化,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基于西方传统城镇化经历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和相关理论在就地城镇化研究上的局限性,提出了一个超越城乡二分法,通过分析城镇要素在乡村产生、累积和发展的过程对就地城镇化予以正面、直接和完整检视的分析框架。

2. 从常规市镇人口增长构成和城镇要素在广大区域产生、发展和累积过程两个方面分析了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应用 GIS 技术和构建综合城镇化水平指标等方法,定量揭示了就地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城乡融合区和“准城镇人口”在中国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尤其是其扩展大都市区和县域城镇化整体进程和空间

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3.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指出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和土地制度、政治与经济体制)、人口基础(人口密度与人口规模)、交通通讯设施、乡村创始力与乡镇企业发展、外商投资等是影响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就地城镇化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宏观因素,并不同程度地决定着其就地城镇化进程;揭示了源自乡村、推动乡村变革和发展的乡村社区创始力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驱动力作用,以及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类似于城镇的人口密度和经济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在就地城镇化产生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4.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就地城镇化的行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区位选择和迁移意愿,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就地城镇化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城乡界限的淡化导致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地理基础的变化,使大部分企业在乡村地域同样拥有发达的交通条件、充足和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较低的技术、交易和信息成本等条件,从而不必也不愿长距离迁往位于或靠近大城市的区位。这种微观地理基础的变化还导致乡村拉力的作用大于传统理论所预期的城市拉力的作用,从而使当地居民选择了就地转型。对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的分析相互呼应,进一步证实了就地城镇化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5. 分析了外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和中心城市在城镇化整体进程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对就地城镇化地位、发展和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就地城镇化已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成为一种异地城镇化,但这并未改变就地城镇化地区人口和聚落分布的整体空间格局。中心城市在城镇化整体进程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口和聚落分散分布的空间格局并推动了“准城镇人口”加速向常规市镇人口转化,但这些空间集聚过程主要是在乡镇一级完成的,就地城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区域为基础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相当程度上仍得以保持,并影响着今后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城镇化的整体空间格局。

6. 对中国内陆地区就地城镇化的条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内陆地区在人口密度、交通通讯和相关制度等方面也存在促成就地城镇化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在思想观念、地理区位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条件不如沿海地区,从而影响了其就地城镇化的产生和发展。内陆地区可借鉴沿海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在农村非农化、本地资本积累、培育发展工商业的文化环境并制定相关政策、因地制宜发展地方产业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推动就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7. 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就地城镇化对当今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重要启示:① 建立基于“城乡连续统”的概念框架,在此基础上完整准确地认识和刻画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异和乡村—城镇转型过程;② 建立非二元化的城乡划分标准和指标体系,从统计上反映乡村—城镇转型的连续渐变性质;③ 从高人口密度和发达的交通通讯条件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人口迁移的替代作用,地方历史地理背景、乡村创始力与“边缘地区”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就地城镇化发达地区的经历对“自下而上”发展理论和战略的启示三个方面,对以区域(面)为基础的城镇化和区域发展过程做出新的理论解释。

8. 分析了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城镇要素在乡村的产生和累积所产生的规划需要,以

及当今城乡规划模式无法与之相适应的情况,并从规划理念、规划单元、规划方法、规划内容等方面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相应建议,包括必须打破行政区的限制和城乡规划二元分化的格局,引入城镇区域(city region)的概念进行区域规划,将区域规划纳入城乡规划的法定体系;并在规划实践中满足城镇要素累积带来的规划需要以及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要求,使城乡规划真正融为一体,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落于实处。

上述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界相关领域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演变与对策”课题组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已在《地理科学》《地理研究》《Urban 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Dynamic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ase Studies and Lessons Learned》等国内外权威刊物和专著中发表了多篇阶段性成果,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的《2007 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以专门案例的形式报道了课题组关于泉州市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初步研究结果。笔者还先后应邀在包括第四届国际人口地理学大会(2007 年)、美国人口学会 2008 年会、美国亚洲研究协会 2011 年会和 2011 年国际亚洲学者大会等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报告相关研究成果,并得到与会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笔者还应邀于 2009 年 6 月在福建省社科联组织的《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座谈会上,根据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提出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重视“城乡融合区”规划和发展的建议,并被刊于 2009 年 6 月 2 日的《福建日报》求是版,并应邀结合本研究成果为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国忠主编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读本》撰稿,从而使本成果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重视和应用。

本书是笔者带领由笔者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所组成的团队历经 4 年通力合作、辛勤工作的结果。各章研究和初稿主要由以下人员完成:朱宇(第 1、6、7、9 章);朱宇、林敏(第 2 章);祁新华、朱宇、林李月、林敏(第 3 章);祁新华、朱宇、林李月(第 4 章);王国栋(第 5 章);祁新华(第 8 章)。全书最后由朱宇通稿完成,祁新华博士在上述过程中协助笔者做了大量工作。在课题研究和本书完成过程中,笔者的其他研究生肖宝玉、胡宗潭、何开进、吴梅华、易月香、邵怀友、李祥德、陈文哲、韦小丽、夏金林、郭欣欣、胡陈冲、张红丽、阮朝扬、余立、董洁霞、陈金梅、吴炎军、张苏北、田盼盼等也都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在本书出版之际,笔者也谨代表课题组成员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对本书研究工作和出版的资助;感谢福建师大地理科学学院对本书出版的资助;感谢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题过程中多位匿名审稿人的批评和建议。限于作者的水平和时间、经费的限制,本书还存在许多缺憾、不足和错误,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朱 宇

2012 年 6 月于福建师大仓山校区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基于传统模式的城镇化研究的二元分析框架 4

1.3 城乡界限的淡化和人类聚落的近期演变：二元分析框架所面临的挑战
..... 6

1.4 “就地城镇化”概念的辨析 9

1.5 主要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13

2 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地位 22

2.1 从常规市镇人口增长构成的分析看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中
的地位 22

2.2 从区域城镇要素的累积看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地位 25

2.3 从“城乡融合区”及其中的“准城镇人口”看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整体进程
中的地位 31

2.4 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就地城镇化及其在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地位 36

3 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宏观机制 44

3.1 就地城镇化的制度因素 45

3.2 就地城镇化产生的人口地理基础——人口密度与人口规模 52

3.3 就地城镇化产生的交通通讯条件 54

3.4 乡村社区创始力、乡镇企业发展与就地城镇化的内部驱动力 58

3.5 就地城镇化的外来驱动力——外商投资 61

3.6 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宏观机制的定量分析：以福建省县域就地城镇化
为例 65

4 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	70
4.1 就地城镇化的微观机制：企业的视角	70
4.2 就地城镇化的微观机制：个人的视角	88
5 就地城镇化的若干重要演变	102
5.1 外来流动人口在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02
5.2 城镇化政策和整体进程的演变及其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	108
5.3 就地城镇化自身演变及其空间格局的最新趋势	111
6 中国内陆地区的就地城镇化	116
6.1 中国内陆地区就地城镇化的历史	117
6.2 中国内陆地区就地城镇化的现状：若干特点与沿海地区的差距	120
6.3 中国内陆地区就地城镇化的条件：与沿海地区的类似和不同	125
6.4 沿海地区就地城镇化的经验对内陆地区的启示	129
6.5 中国内陆地区就地城镇化的展望	132
7 超越城乡二分法：就地城镇化对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启示	138
7.1 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对城乡差异和乡村—城镇转型过程的再认识	138
7.2 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的城乡划分和统计	140
7.3 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的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理论	142
8 就地城镇化的规划调控	148
8.1 传统城乡规划模式及其在就地城镇化地区的适应性分析	148
8.2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规划调控对策	158
9 主要结论	161
9.1 城乡界限淡化背景下的就地城镇化及其对城乡二元分析框架的挑战	161
9.2 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地位	161
9.3 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宏观机制	162
9.4 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	163
9.5 就地城镇化的若干重要演变	164
9.6 中国内陆地区的就地城镇化	165
9.7 就地城镇化对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启示	165
9.8 就地城镇化的规划调控和政策措施	166
参考文献	167
附录一 第4章企业主(或企业负责人)调查问卷	176
附录二 第4章职工调查问卷	188

图 目 录

图 1-1	麦吉的城乡融合区(Desakota)及其与周边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关系	7
图 1-2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16
图 1-3	典型研究区域区位示意图	17
图 2-1	福建省 2000 年各县、市(区)N/U 值分布图	27
图 2-2	泉州市的核心区、城乡融合区和其他地区	34
图 2-3	福州市的核心区、城乡融合区和其他地区	35
图 2-4	福建省各县城市镇人口比例	41
图 2-5	福建省各县域准城镇人口分布图	42
图 2-6	福建省各县域准城镇化水平	43
图 2-7	福建省各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	43
图 4-1	西方工业区位理论发展轨迹	72
图 4-2	就地城镇化地区人口迁移“双拉力”概念模型	96
图 5-1	2004 年泉州市各乡镇外来人口分布图	105
图 5-2	2004 年泉州市各乡镇企业就业人口分布图	105
图 5-3	2005 年东莞市各乡镇外来人口分布图	106
图 5-4	2005 年东莞市各乡镇企业就业人口分布图	106
图 5-5	1990 年泉州市各乡镇企业就业人口分布图	113
图 5-6	2007 年泉州市各乡镇企业就业人口分布图	113
图 6-1	中国 2000 年县一级非农就业比分布示意图	121
图 6-2	中国 2000 年县一级人口密度分布示意图	126
图 6-3	2009 年全国百强县(市)的分布	134
图 8-1	城乡规划中聚落体系规划示意图	153

表 目 录

表 1-1	福建省、江苏省、广东省主要经济社会指标(2008 年)	19
表 1-2	东莞市、昆山市、泉州市和晋江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2008 年)	20
表 2-1	“三普”至“四普”、“四普”至“五普”中国市镇人口的增长构成	23
表 2-2	1982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期间福建省市镇人口的增长及其分解	24
表 2-3	1982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福建省各规模等级城镇的人口	25
表 2-4	1999 年福建省乡镇企业产业和就业结构	29
表 2-5	福建省乡镇企业及其就业人员分布(1996)	30
表 2-6	泉州市和福州市及其各分区的人口和面积	36
表 2-7	城镇特征指标标准值及特征比权重	40
表 3-1	19 世纪末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	53
表 3-2	福建省农村交通通讯指标	56
表 3-3	祖籍福建的华人(华侨)数量在前 10 位的国家和在福建省投资规模在前 10 位的国家	63
表 3-4	自变量的指标选取及其内涵	66
表 3-5	逐步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67
表 4-1	受访企业所有制结构	73
表 4-2	受访企业行业结构	73
表 4-3	受访企业创办时间	74
表 4-4	受访企业现有区位	75
表 4-5	受访企业在城镇建成区与各级开发区的分布	75
表 4-6	受访企业搬迁历史	76
表 4-7	受访企业搬迁方向	76
表 4-8	受访企业迁往大中城市计划	77
表 4-9	受访企业迁往城镇建成区或开发区(投资区)的打算	77
表 4-10	受访企业创办于本市/县的首要原因	78
表 4-11	受访企业目前区位的便利程度	79
表 4-12	受访企业创办的首要条件	81

表 4-13	受访企业目前区位在获得人才上的便利程度	81
表 4-14	受访企业创办时厂址与办公场所的来源	83
表 4-15	受访企业产业类型	84
表 4-16	受访企业创办时对一线工人的学历要求	85
表 4-17	受访企业创办时的资金来源	86
表 4-18	受访企业创办的目的	86
表 4-19	受访本地职工的户籍结构	90
表 4-20	受访本地职工的性别比例	90
表 4-21	受访本地职工的年龄结构	91
表 4-22	受访本地职工的受教育水平	91
表 4-23	受访本地职工 1995 年以来搬迁情况	92
表 4-24	受访本地职工的迁移区位选择	92
表 4-25	国家政策对人口迁移没有限制时受访本地职工的迁移意愿	93
表 4-26	受访本地职工迁移意愿的区位选择	93
表 4-27	受访本地职工迁移意愿:城市规模类型选择	94
表 4-28	受访本地职工建房选址意愿	94
表 4-29	受访本地职工对当地就业机会的评价	97
表 4-30	受访本地职工对收入情况的估计	97
表 4-31	受访本地职工不想迁移的主要原因	98
表 4-32	受访本地职工家庭成员处理责任田的方式	99
表 4-33	受访本地职工想迁移的主要原因	99
表 5-1	泉州市外来人口在非农化、城镇化中的地位	103
表 5-2	2004 年泉州市各区县外来人口在乡镇就业的比例	104
表 5-3	福州、厦门、泉州市辖区市镇人口及其占福建省市镇总人口的比例	109
表 5-4	2000 年后福建省和泉州市 N/U 值	110
表 5-5	1990 年以来泉州市、东莞市乡镇企业的发展	112
表 5-6	1990 年以来泉州中心城市 GDP 与财政收入占全市的比例	114
表 6-1	2000 年福建省与河南省城镇人口组成结构比较	120
表 6-2	巩义市与晋江市 2008 年规模以上工业的轻重工业产值比较	122
表 6-3	巩义市与晋江市 2008 年各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产值比较	122
表 6-4	2001 年和 2008 年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实际利用外资情况比较	128
表 6-5	郑州市与泉州市所辖县市出口总值情况比较(2004~2008)	128
表 6-6	历届内陆地区全国百强县市数目变化情况	132
表 6-7	流动人口将来返乡后的职业打算	135
表 8-1	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分级	151
表 8-2	城市规划人均单项建设用地指标	152

表 8-3	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分级	152
表 8-4	村镇建设用地构成比例	152
表 8-5	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分级配建表	154
表 8-6	村镇公共建筑项目配置	156

1.1 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国人口城镇化^①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一些与西方传统经历不同的人口城镇化形式扮演了重要角色。与西方以人口的乡村—城市迁移为主要途径、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传统城市化经历不同,我国乡村地区出现了大量聚落和人口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和重组而实现了向城镇或准城镇类型转化的现象,朱宇将其称之为“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Zhu,1998;1999;2004)。这一现象在我国沿海较发达地区相当普遍,其突出表现是乡村人口密度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城郊的水平,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非农活动发达,城镇式设施和生活方式渐趋普及,城市活动和乡村活动相互交融,城乡两个方面特点兼具的地域类型十分突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苏南、珠江、晋江、温州等模式中,上述现象均有着突出表现。这种现象涉及规模巨大的人口和范围广泛的地域,其演变、规划和调控对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整体进程有着重要影响。

这一现象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在国际上,这一现象被国际著名城市和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寻常的转变过程之一,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这一概念及包括朱宇所做工作在内的相关研究也在他最近的专著中被多次引述(Friedmann,2002;2005)。在 2004 年出版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城市化工作组的专著和 2006 年国际人文地理学权威刊物《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一篇综述文章中,中国的就地城镇化都被视为当今城乡界限淡化条件下人类聚落系统发生重大改变的证据之一(Champion et al.,2004;Hugo,2006)。2007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公布的《2007 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也以专门案例的形式报道了朱宇等所做的关于泉州市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初步研究

① 在我国,对应于英文 urban 的中文术语有“城镇”、“城市”,对应于英文 urbanization 的术语则有“城镇化”和“城市化”。参照周一星(1999: 59—60)的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将在把城镇作为乡村的反义词这一意义上来定义城镇和城镇化,并尽量统一使用“城镇”和“城镇化”两个术语。城镇化直接对应于英文中的 urbanization 一词,而并无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在中国所特有的低等级、不完全城市化(如冯兰瑞,2001)的含义。但由于“城市”和“城市化”的使用十分普及,在某些必要的语境下,“城市”和“城市化”也可能与“城镇”和“城镇化”混用。

(UNFPA, 2007)。在国内,“就地城镇化(*In Situ* urbanization)”这一术语的使用不如在国外那么直接和广泛,其原因本章稍后将作进一步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地城镇化现象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对“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现象的研究开始,国内外学者们也已从不同角度间接地对这一城镇化过程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费孝通对苏南模式的研究开始,许多学者对主要发生于乡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珠三角、晋江、温州等区域的发展模式予以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考察,揭示了这些以乡村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模式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在上述模式下乡村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转变超前、空间转移滞后的特征,并使乡村城镇化研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如费孝通,1984;王嗣均等,1996;许学强等,1998;郑弘毅等,1998;陆学艺等,2000;薛德升等,2001;陆学艺等,2007;许学强等,2009;陈玉福等,2010)。这种模式往往在沿海大都市周围地区最为发达,并由此导致相关研究在两个互为关联领域的发展。这两个领域一是对大都市区周围或之间“与传统的城乡二元景观截然不同、城乡职能与景观混杂交错的新型地域或景观类型”(刘盛和等,2005)^①的研究,二是以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扩散为背景,对这些地区乡村城镇化及其与都市区、都市连绵区联系的考察(胡序威等,2000)。

其次,包括上述工作在内的许多研究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主要从国家和地方政策、资金来源、社区政府的作用以及农民主体行为等方面探讨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等理论或范式(Ma et al., 1993; Ma et al., 1994; 崔功豪等,1999; 辜胜阻等,1998; 辜胜阻等,1998)。在这种动力机制及其研究中,国家在土地、户籍、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因素占据了重要地位(许学强等,1998; 许学强等,2009)。

最后,许多学者对这种以乡村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的积极效应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它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在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假城市化和大城市病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王嗣均等,1996)。然而,许多研究也指出了这种模式的局限和弊病。乡镇企业布局分散所导致的集聚效应缺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即是上述局限和弊病的突出体现(刘传江等,2004; 王小鲁,2002; Friedmann, 2005; 陆大道等,2006; Martine et al., 2007)。

上述研究无疑是我们进一步考察就地城镇化及其演变的重要基础。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上述研究中,就地城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整体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城镇要素在乡村产生、累积和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等关键问题并未得到正面、直接和完整的检视。事实上,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是建立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传统城乡二元的分析框架和聚落分类基础上考察与就地城镇化相关的过程。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城镇化不仅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之间泾渭分明,其最终结果是乡村为城镇所取代。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框架,作为一种以乡村为基础的区域发

① 即本章稍后将提到的 Peri-urbanization 所涉及的地区。

展模式,就地城镇化在迄今研究中往往是被作为一种违背“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为我国所特有的一种不正常现象来对待的。在此前提下,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其正面作用则是不可持续的(如廖丹清,1995;Zhao,2002)。这种“不正常现象”之所以能在我国发生发展,则主要归因于我国特有的制度因素,即计划经济时期的遗产对人口和企业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限制,而户籍制度则是这种制度因素的典型代表(如谢晋宇,2002;成德宁,2004)。对就地城镇化的这种先入之见往往成了许多研究的逻辑前提,其后果之一是就地城镇化往往被视为一种短期、局部并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自行消亡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就地城镇化在中国迄今为止的城镇化研究中未得到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条件下进行的,城乡界限的淡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诸如“城乡融合区(desakota regions)”“乡村都市带(ruralopolises)”等城镇化的新形式,就地城镇化在这些城镇化的新形式中也有着突出表现(McGee, 1991; Rimmer, 2002; Qadeer, 2004; UN-HABITAT, 2008)。这些国际经验说明,就地城镇化在当今城乡界限淡化的条件下有其存在发展的普遍性和客观必然性,必须在超越城乡二元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基础上予以深入研究。在国内,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也向我们提出了进行这方面研究的需要。在一些就地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余年中尽管经历了种种变化,但仍在城镇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朱宇, 2006)。进入 21 世纪以来,许多被认为是导致分散发展模式的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计划经济体制等)已被大大削弱,然而本书作者在福建和其他学者在浙江等地所做的一些调查都说明,不少乡村—城镇就地转型发达地区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居民的迁移意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他们中除了一部分有向当地城镇和工业区、开发区集中的趋势外,并没有大量向大中城市转移或迁移的愿望(王桂新等, 2002; Zhu, 2002; 卫龙宝等, 2003)。这些都表明,就地城镇化并不是一种短期、局部而可以予以忽视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发展也已难以在城乡二元的分析框架下为我国特有的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所完全解释,需要在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下予以重新审视。事实上,如稍后详述,人口密度、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国外“城乡融合区”“乡村都市带”等城镇化新形式的发生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迄今在国内对就地城镇化相关现象的研究中,这些因素很少被涉及。同时,迄今研究也很少涉及这一现象的行为主体,即企业和居民的空间动态;从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居民的迁移意愿的角度深入考察就地城镇化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因此,对就地城镇化研究还有着在深度和广度上予以进一步开拓的迫切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对其完整全面的认识。

还必须看到的是,与就地城镇化相关的现象出现至今已 30 余年,然而至今我们的大部分研究还多是对这些现象的静态考察,忽视了对这一现象的演变趋势和规律的研究。如果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就地城镇化的真实写照的话,这一表述在今天已与就地城镇化的现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就地城镇化并不意味着乡村人口在原地的绝对静止,它并不排除乡村人口在城乡聚落体系内部一定范围

内的调整；近 30 年来它的发展与小城镇和各类开发区、工业园、甚至乡村新型社区的建设密切相关，并已因此对乡村聚落和城镇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地城镇化的这种动态演变和规律对我国的城乡发展和规划有着重要意义，也急需予以揭示。

本书所做的研究即是为顺应上述对就地城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进行这一研究，首先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研究的重视，正视这一现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突破迄今在就地城镇化研究上的局限，较为完整地揭示其在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认识其演变趋势和规律，以发挥其积极效应，克服其弊端，使其顺利融入我国城镇化的新阶段，并与大城市、都市区规划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衔接。由于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地城镇化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特别突出，我们也希望在这一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在发展基于中国城镇化实践、适合中国特色和当代条件的城镇化理论并使其走向世界过程中能起到一定作用。

1.2 基于传统模式的城镇化研究的二元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就地城镇化是一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经历有所不同的新的城镇化形式，它已难以用传统的“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来解释，需在超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予以深入考察。那么，传统的城镇化经历以及基于这种经历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和相关理论有何特点？为什么这些理论已不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在展开对就地城镇化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此作一简要的评述。

对迄今世界城镇化的经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概括和总结，其中两条规律占有突出地位。第一条可称为城镇化的必然性规律，它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农业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通过乡村—城镇迁移向工业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还被不少论者视为等同于城镇化过程。第二条为大城市超前发展规律，它指出，在城镇化的早中期阶段，大城市的增长快于中小城镇的增长（王嗣均，1995；廖丹青，1995；王放，2000；高珮义，2004）。这两条规律在迄今为止我国人口城镇化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朱宇，2006）。

学者们的研究还为上述规律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这种理论解释曾被笔者概括为两个方面（朱宇，2001）。首先，经济结构转换的二元模型和集聚经济理论解释了城镇化的必然性规律。1954 年刘易斯创立的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Lewis，1954）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同时将经济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即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的过程。按照这一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里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是零，农业部门的工资很低。而城镇的工业部门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尚在扩张。由于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其工资也必然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镇。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镇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达到现代化。这一模型不仅揭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此后许多人

口城镇化研究,尤其是通过乡村—城镇人口迁移而产生的人口城镇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69年提出的在乡村—城镇人口迁移和人口城镇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托达罗模型也是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的,其不同之处是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镇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Todaro,1969)。

二元经济模型虽然揭示了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但其自身仍不能完整地解释人口城镇化的必然性,因为它未能说明为什么工业要集中分布于城镇。集聚经济理论弥补了二元经济模型的这一不足。根据这一理论,城镇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较集中、有规模的市场,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大幅度降低私人 and 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聚集效应会吸引工业向城镇集中,这种集中还会进一步加强城镇的聚集效应,从而促使城镇规模扩大。当然,当城镇规模太大时,其外部成本也会上升,从而使这种聚集效应逐步走向反向(Friedmann, 1966; 王小鲁等, 1999; 世界银行, 2009)。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和集聚经济理论一起,为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解释城镇化的必然性提供了一个高度简化的理论框架。

上述理论,尤其是集聚经济理论已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城市超前发展规律,因为前述大城市较为优越的各类条件易于吸引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向其集中,而这种集中所产生的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又促进了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种解释还未把城镇放在它所处的区域中来考察,而城镇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过程还与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范式”(the center-periphery paradigm)是从这一角度考察城镇化过程的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模式(Friedmann, 1966)。根据这一模式,城镇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为服务和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此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资本、技术、创新以至权力都向一个或两个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城市集中,从而逐渐形成以最大的城市为中心区,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的二元空间结构。这种区域差异在工业化过程中还会随着资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向中心区转移而扩大。只有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而趋于成熟时,上述发展过程才会向边缘区涓流,使边缘区也得以发展。这时通过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的主动行动,以及整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区域差异得以缩小,空间平衡得以扩大,最终将形成仅有最低必要限度区域不平衡的完全一体化的空间经济。根据这种模式,空间极化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过程,而大城市的发展则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寻求最高生产力的需要。这种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将区域发展看作是一种创新和现代化在区域聚落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地区,尤其是大城市是创新性变化的中心,因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riedmann, 1972)。从这一视角出发,大城市在城市化早、中期的超前增长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城市化的必然性规律和大城市超前发展规律,还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弗里德曼的“中心—边缘范式”,其背后都隐含着二元化的分析框架。这种二元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乡划分为有着严格的地理界限和“城镇工业、乡村农业”的功能区分的两个对立部分。在这种概念框架之下,经济发展过程即是乡村劳动力通过